

# 生死民主

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



John Keane

[澳] 约翰·基恩 著 安雯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

# 生死民主



[澳] 约翰·基恩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Democracy by John Keane

Copyright © 2009 by John Kean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M. Heath & Co.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民主 / (澳) 约翰·基恩著；安雯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0

书名原文：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

ISBN 978-7-5117-3057-2

I . ①生… II . ①约… ②安… III . ①民主－研究

IV . ① 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5128 号

## 生死民主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贾宇琰 赵 灿 朱瑞雪

特约编辑：田 奥 张嘉宁 王嫣婷

责任印制：尹 琪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960 毫米 × 1300 毫米 1/32

字 数：759 千字

印 张：27.875

版 次：201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18.00 元

---

网 址：[www.cctphome.com](http://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mailto: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 前言 月残，梦缺……

---

此时此刻，昨日往昔  
至明朝皆或旧相识，  
所有新日月，尽闻老曲里

——T. S.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之“焦灼的诺顿”(1936 年)

历史经常被说成是一本人类悲伤的记事簿，一部永远没有收场的溜须拍马的故事，一间充满罪恶的屠宰场。但事实并非永远如此。奴役的枷锁可以被砸烂，就像 2600 年前，生活在欧洲大陆东南沿岸的希腊人民开始了一项创新，它和车轮、印刷术、蒸汽机和干细胞克隆这些重大发明有着同样的历史重要性。这项创新始于对暴君的反抗，但在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浪。很少有人留意到它的新意。有些人指责它给世界带来了混乱，但没有任何人预见到它的普世号召力。它不过是人间世事大循环的一部分——各种争权夺利中的一个新样板而已。但很快，人们对这个创新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它在全世界唤起了千百万人的激情，毫不奇怪，因为它要人类给自己描绘一幅崭新的、从未有过的生活图景。这项创新带有一种迷人的痴心妄想，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被萦绕其中：希腊人称之为“德莫克拉提亚”——*dēmokratia*，民主。

人们渴望着要将现在的世界加以改造，以拥有一个不一样的、更美好的未来，此番梦想经常受到嘲笑。但梦想仍然是人类一个不可或缺的特性。无论何时，只要我们用语言提到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要涉及一些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忍不住要猜测，我们的叙述词不达意，或者在表达某种愿望的时候，实际上想要的却是另外一件东西。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我们用来表述的语言，就是一连串无休无止的小梦境，在叙述中，我们有时推崇某种新的表达方式，遣词造句特别贴切，可以对他人产生奇特的感召力。这个阴性的名词 *dēmokratia* 就是从人类的一个

小梦境中生出的一个小字眼，但是它产生了巨大的后果。它唤起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亿万民众——帮助他们把握自己的命运，它改造世界的方式之彻底，至今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评价，也没有得到完全正确的理解。与那些用发明者的大名——牛顿、胡佛、欧姆命名的发明不同，民主没有告诉我们谁是这个字眼的始作俑者。构成民主一词的几个词源，以及它们到底是在何时何地第一次开始使用的，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民主小心翼翼地保守着它的秘密。透过历史悠远的迷雾，只能偶然地看到几丝线索，即便这一点点线索，还被掩盖在粗野、邋里邋遢的人物身后，这些人的名字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比如曼提尼亞的德莫纳克斯（Demonax of Mantinea）。他是一位留着大胡子、身上披着长袍、脚上穿着编织凉鞋的雅典立法人，在公元前 550 年左右，他受德尔斐阿波罗神庙女祭司的召唤，被派往今日利比亚沿海的农耕城邦昔兰尼。德莫纳克斯向昔兰尼讲希腊语的居民授权，说他们可以反抗一瘸一拐、说话结结巴巴的暴君巴图斯三世，并让昔兰尼人有权召集人民大会，用自己制定的法律实行自我管治。

德莫纳克斯也许是第一批称自己是民主之友的公共人物，只是我们不能肯定事实是否如此。<sup>①</sup>德莫纳克斯的演讲和他制定的法律都没有流传下来。这让他更合适作为民主的象征，仿佛为民主保守着神秘感，与那些自认为了解了民主的一切的人唱着对台戏。民主这个题材，充满了谜团、困惑和似是而非的事物。它蕴藏着不少的惊奇——本书第一次证明了民主肯定不是希腊人的发明。那种认为民主是或者能够是一种普世的西方价值、一件欧洲送给世界的大礼的信念，彻底被否定了。这也是为什么，任何具有一点时代精神的民主史，首先要厘清的问题就是希腊对民主的抄袭。希腊的大部分戏剧、诗歌和哲学著述中都有人声称，在公元前 5 世纪，雅典人夺得了开创民主思想和实践的桂冠，当时的同代人似乎也认为此事无可争议。从那时起到今天，大部分谈论民主历史的人一直在重复这个故事。但，这是一个谎言。

《生死民主》是第一次尝试记录民主初生后一个多世纪内的生命和它所处的时代的作品，说明民主这个小小的名词要比古希腊的评论家们提到它的时间古老得多。它的根系可以一直追溯到迈锡尼时期的线形文字

B,该文字使用于比古希腊要早上 7 到 10 个世纪的青铜文明的末期(公元前 2000—前 1500 年),当时文明的中心是迈锡尼和伯罗奔尼撒地区的一些城市定居点。我们不知道迈锡尼人怎样和何时开始学会使用一个双音节的字 *dāmos*(“德莫”),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一伙曾经占用过公地的、没有权势的人,还有一个三音节的词 *damokoi*(“德莫阔”),意思是指一位代表“德莫”行事的官员。这两个词汇,衍生出我们今天用来表示民主的词族,它们是否有来自更东方的源头,比如古代苏美尔人的语言中的“*DUMU*”,意指生活在一个具体地方的“居民”“儿子”或“孩子”,这是我们至今仍不清楚的事情。但是,当代考古学的新发现,让人们对这些无法确定的猜测更加好奇:大会式自我治理的民主实践也不是希腊人的发明。最早点燃大会式直接民主之光的地方是在“东方”,在当代的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一带。这种民众自我管治的习俗后来向东输出,传入印度次大陆,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1500 年之后,在吠陀时代的早期,由大会进行统治的共和国在印度非常流行。这一习俗也向西传播,首先到达腓尼基人的城市,如比布鲁斯(Byblos)和西顿(Sidon),接着才是雅典;在公元前 5 世纪,雅典人才声称这是西方独有的特色制度,是雅典优越于东方“野蛮人”的一个标志。

如同火药、印刷术和其他来自远方的舶来品一样,民众大会和(后来才输入的)字眼 *dēmokratia*(民主)进入我们今天称之为“西方”的地盘之后,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我们甚至可以公平地说,它的传入让历史成为可能。如果将民主简单地理解为人民的自我治理,它包含了某种至今仍然非常激进的思想:它表示人类可以发明并启动一种制度,其特殊的设计让人们彼此作为相互平等的人,共同决定大家在这个世界上如何一起生活。我们今天来看,这一切都很直截了当,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但是让我们好好地想一想。这个小小的梦想蕴含着一个重大的观念,生命有限、血肉之躯的凡人能够作为彼此平等的人在论坛或大会场上组织起来,他们要放下手里的劳作,开始思考一些事情,然后决定采取某种行动——这个意义上的民主是一项令人颤栗的创新,因为它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人类的政府。

当然,所有的政府都是“人类”的,它们都是由人类创造、管理和运作。

这个叫作民主的政府形式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告诉人民,刻在石头上的偶像没有任何意义,每一件东西都建筑在时间和地点的流沙上,世事无常在。因此,对他们来说,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作为平等人在一起,以开放和灵活的姿态共同建设和维护大家的生活。民主要求人民看透所有宣称特权的谎言,不论其来自神、自然,还是大脑或血统的优越。民主意味着改变权力的性质,也是告诉世界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莫过于如何防止那些自封超人的少数人、富人或者强人的统治。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秩序,它确保了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它们的问题永远保持开放性;它承认,尽管人民不是天使或天神,但他们至少有能力防止某些认为自己就是天使或天神的人为所欲为。民主的目的是要政府为谦卑者拥有、为谦卑者治理并为谦卑者所享受,它是平等人之间的自我管治,是人民不再将主权交给想象的神、暴君、智者、传统的力量,或者就是因为懒惰和习惯而交给什么方便的人,让他们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是自己来制定法规,并据此举行大会管理自己的事务。

为什么这个意义上的民主在经历了 2600 年之后仍然吸引着人们?为什么要费时费力去论述或去阅读一部新的民主史?对这些问题可以有很多的答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非常直截了当。对于那些爱好人类发明史的人来说,《生死民主》提供了不少古老政治制度和理念的奇特起源的新细节,比如如何通过公共大会进行管治、妇女投票、不记名投票、陪审团断案和代议制国会。那些对我们今天称为民主的种种制度,如政党、强制投票、司法复核、公投、选举人制度、公民社会,还有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感到好奇的人,能在本书中找到不少有趣的章节。同样,那些对变迁、对民主含义到底何在的激烈争论,或者对民主关键词汇的来源感兴趣,或者喜欢看看调侃民主的可笑段子,或者想听听激烈反驳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意见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失望。

本书的每一页(以及在最后章节对历史和民主的简要思考)都是想要强调指出,忘记过去,或者记住的“历史”缺少真实性,都会给民主带来危险。那些似乎永恒的东西从来不会留存很久。谨举一个表面上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的例子:与选举有关的语言,活像是一个乱糟糟的喜鹊巢,包罗了来源迥异的各色大杂烩。来自古拉丁文的“选举”(election),原意

是“选择,(在数种可能性中)挑选”。但在这个词族中,特指那些能够进行选择的人的“选举人”(electorate)一词则是很晚才出现的新词汇,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的记录是在1879年。在那之前,大家只使用“选民”(electors)一词。今天,我们将人们普遍得到投票权称为“普选权”(franchise),也即“授予公民权”,而这个来自13世纪英国的词汇,原意是“自由,免于受奴役和被主宰”。“franchise”一词后来被用来指“在法律上免于刑诉”,之后才演绎出几种新含义,包括授予某项权利或某项特权,比如,君主下令让某人免于被逮捕,或者让某人“有参加选举的权利”(elective franchise,投票权)。此外,今天这个词还用于指公司授权某人在指定地点销售产品或进行贸易的许可证。另外,比如“投票”(voting),这个词来自拉丁文“*votum*”,在16世纪时进入英文,当时的意思是“期望或者发誓”,大约在1600年前后的苏格兰,这个词开始有了今天的含义:在选举中表示选择的行动。“poll”今天也用来指与“投票”有关的活动,可以译为“投票”“投票站”“投票记录”等。它原是一个古老的荷兰文和德文词,在另外几个古老的地方语言中也能见到这个字眼,意思是“头”(head)。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poll”有了全新的意义,它被用来特指在选举中点算支持者的人数。这项发明颇受争议,因为“点头数”(to poll)一词同时也可指剪头发或者砍掉一个人或一只动物的脑袋。无论如何,点算票数结束了选举中原来长期使用的腐败手段,即哪位“候选人”(candidate)的支持者叫喊的声音最响,就算这位候选人赢得选举。“候选人”这个词则来自古罗马共和国,当时拉丁文中“*candidatus*”的意思是“穿白色衣服的人”。它特指那些政治家,他们在争取成为参议院议员时,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而披上耀眼的白色袍子。

不用说,洁白和纯净这类含义通常和候选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同样奇特的字眼还有选举中的黑色词汇,如“选票”(ballot)——它的词源是意大利文的“*ballotta*”,原意是“一只黑色的小球”,投票时将其秘密地放入一个罐子或者一只盒子,这正是18世纪绅士俱乐部的会员们脑子里转动出来的念头,当他们想否决一项提案或其他人的提议时,就是将一只“黑色的小球”放进收纳选票的容器,或者称“票箱”(ballot box)。“Blackballing”(这个动名词的字面意思是“将黑色的小球放进票箱”),被用来指拒绝、否

决或者是投票反对某事某人，直到今天，“黑球”仍然和选举有某种关系（比如我们在 2000 年韩国议会大选中所见，当时公民联盟发起运动，反对一批“不适合”的候选人，对他们进行“黑球”抵制<sup>②</sup>）。不过，黑色和白色的小球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这些组成语言的词汇告诉我们，用这样的语言来思考和体验的民主，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尼日利亚，在加拿大还是乌克兰，民主的语言都有自己的历史性。

《生死民主》试图提醒读者，我们所知道的民主政治的每一个转折点、每一种习惯和每一种制度，都是具体时代的产物。民主不是一个永恒的、命中注定要实现的政治目标。在我们过去的政治经历中，它不是一个自始至终的存在，而在今后，它也不会从此和人类相伴到永远。在这个人们  
xv 对民主的含义、功效以及价值存在着巨大分歧的时代，本书特别想让读者意识到民主所具有的偶然性。当然，民主通常是指一种政治制度，在这个特殊的制度中，人民或者他们的代表根据法律管治自己，而不是被其他人所管治，比如说被军事独裁、极权政党或君主所管治。最近几十年来，这个意义上的民主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像计算机和 OK 等词汇一样，“Democracy”（民主）成为世界上最为人所知的英文单词之一。有些评论家说到了民主在全世界的胜利，或者声称民主已经是一种普世价值。但事实上，无论民主这个字眼的含义是什么，它是否以及为什么一定会战胜对手，仍将是备受争议的问题。对于现有的民主国家，如美国、英国、印度或阿根廷是否算得上是他们自己所宣称的民主国家，大家仍然是各有各的看法。而针对他们所宣扬的民主理想本身也存在很多争议。一个最常见的，也是本书着力要厘清的一个争议点，就是在提倡“参与”或“直接”民主和“间接”或“代议”民主之间到底有何分歧。前者被定义为所有公民直接介入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的决策过程，比如通过投票形成多数人接受的结果；而后者则是人民通过选举和其他公共表达，选出自己的代表，由他们来代表人民进行决策的管治方式。

## 大会民主

在这样的争议中，如果能认识到民主和其他人类的发明一样，都是一

个历史过程,那就算是有了智慧的开端。民主的价值和制度从来都不是一个刻板的固定模子,甚至民主的含义也在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这是《生死民主》一书的基本观点,本书将历史分为三个有所交叠的时代,民主既被视为一种决策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第一个历史阶段,我们看到了公众大会的诞生和传播。这一时期起于公元前 2500 年左右,地点是在今天的中东一带。这个时期包括了古希腊到古罗马,还有公元 950 年之前的早期伊斯兰世界;在这个时期,从冰岛,现属丹麦、位于北大西洋的法罗群岛和其他一些远离后来被称为欧罗巴大陆的海岛天堂上,都见到过进行自我管治的“大会”(原文可以是 *tings*、*loegthingi* 和 *althingi*)。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古雅典和古罗马共和国代表的几个亮点之外,这个时期一般被认为是非民主、反文明的黑暗世道。一位为人尊重的评论家说过:“随着(罗马)共和国的衰落,南欧完全见不到人民的统治。除了某些规模极小、零星分散的部落还实行民主治理之外,这个政治制度在地球上消失了将近一千年。”<sup>③</sup>

这种在现代西方偏见中根深蒂固的老观念,完全没有根据。事实是,在民主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其基本制度的种子——通过平等人举行会议进行自我管治,在很多不同气候带的不同土壤里生根生长,比如印度次大陆、繁荣的腓尼基帝国和偏远的欧洲大陆的西海岸。在这些地方,除了人民大会之外,还辅以其他制度化的规则和习俗,如成文宪法、付薪陪审员和付薪民选官员、公共场所的言论自由、投票机器、抽签式表决、民选产生或经某种程序挑选的陪审员审判司法案件。此外,还有其他旨在遏制专横统治者的努力,如强制性选举国王、官员有限任期,以及在没有政党、没有召回机制和弹劾机制的年代,通过多数票,不流血地——尽管经常是粗暴地——将煽动家逐出大会。

这些程序在大名鼎鼎的雅典城邦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直到公元前 5 世纪,民主在这里就是成年男性公民组成的大会进行的合法统治。在正常情况下,妇女、奴隶和外邦人被排斥在民主之外。男人们定期聚会,聚会的地点距离雅典的中心广场不远,名为“普尼克斯”(*ponyx*),集会的目的是讨论这样或那样的公共事务,如果大家意见不能统一,就付诸表决,一般是举手表决,有些时候也用将陶片或金属片扔进瓦罐子,以多数

意见为最后决定。在民主的第一个阶段,我们还看到了建立上下两院制的最早实验(有些希腊城邦将上院称为 *damiorgoi*),还有最早的联邦制或者多个民主政府的联盟,如在公元前 360 年前后,阿卡迪亚地区数个讲希腊语的城邦之间通过一个叫作“万人大会”(*myrioi*)的联合会议进行协作。这个时期的很多创新都成为后来民主生活方式的重要组件。其中一些创新发生在伊斯兰世界,包括文字印刷和自治协会,比如“瓦合甫”(*waqf*,或译“瓦克夫”)基金会——宗教性质的慈善基金和清真寺,在经济生活中则有在法律上独立于统治者的合伙人制。伊斯兰教向王权提出挑战,触发了对统治权威的无休无止的激辩。到这个时期的尾声,也就是约公元 950 年,伊斯兰学者甚至挖掘出古老的民主语言。早期的伊斯兰世界特别强调某些人类共同的美德的重要性——比如在宗教信徒和怀疑者中间的宽容和相互尊重,统治者有义务尊重其他人对生命的理解。在这个时期,伊斯兰信仰所包含的善待大自然、自然界与人类相互平等的思想开始成形。这是后来所有民主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紧要问题。

## 代议制民主

公元 10 世纪左右,民主进入第二个历史阶段,其重心在大西洋地区——这一片水域从欧洲沿岸直达美国的巴尔的摩和纽约,向南伸延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乌拉圭首都)蒙德维的亚和(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阶段的起点始于伊比利亚半岛上欧洲人与伊斯兰文明的军事对抗,到公元 12 世纪,这场冲突触发了立法议会(parliamentary assemblies)的制度创新。这个历史时期的结束相当悲惨,战争、独裁和专制占据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历史,几乎彻底毁灭掉民主制度和民主的生活方式。但在开始和结尾之间的漫长岁月里,发生了不少惊天动地的事件。

城镇大复兴,基督教教会内部的宗教之争,低地国家(1581 年)、英国(xviii)(1644 年)、瑞典(1720 年)和美国(1776 年)发生的革命,种种力量共同作用,塑造了新的民主制度——代议制民主。在 18 世纪的法国、英国和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人们开始使用这个词组,当时的立宪者和政论家用此

词特指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不过,没有人知道谁第一次说出了“代议制民主”这几个字,但是这个词组可以追溯到法国贵族,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德·阿让松侯爵(1694—1757)的文章。他很可能是第一个在代表中看到了民主新含义的作家。他于1765年写作的一个小册子在其死后才公之于众,在小册子中,他说:“假民主很快就会落为无政府。此等大众政府,就像是一个造反的人,完全无视法律和理性。在这样的暴力运动和人为的不确定中,显然会产生暴虐的专制。在真正的民主中,人们通过他们的代理人采取行动,代表经选举得到授权;这些民选产生的代表的使命和此类官员所具有的权威即构成公权。”<sup>④</sup>

这是以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看待民主。在这个新政治制度中,人民作为选民,在至少两个选择之间进行挑拣,真正地根据自己的意愿挑选一个人来保护选民的利益,也就是说,代表选民决定与他们有关的事务。到底什么是代表的真谛?谁有权代表谁?当代表违背了他们本应代表的人时应该怎么办?人们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泼洒了不少的墨汁和鲜血。在民主的第二阶段,人们都相信,只有代议政府才算得上是好政府。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意味深长地表示:“如果雅典能够有代议制,它将超越自己的民主”,他的观点为理解18世纪晚期的政论家、立宪者和公民们全力推动的代议制民主新主张提供了某种线索。通常作为君主制的对立面,人们赞扬代议民主是一种更好的政治制度,因为它允许人们公开地表达不同意见——不仅是在被代表的人之中的不同意见,还有那些代表和理应被他们代表的人之间的不同意见。人们还说,代议政府让公民免除对领袖的恐惧,领袖只有在得到公民的信任之后才会得到权力;民选代表这些“临时工”,绝对是非民选的君主和暴君所代表的绝对权力的更好替代品。代议政府还是有效追究政治责任的新方式——它要求按照能力和品德定期更换领袖。民主政府被认为是一种谦卑的政府,它给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派提供存在的空间,为权力竞争创造公平的竞赛场,同时让当选的代表们有机会在有权罢免他们的人面前,检测他们的政治能力和领导技巧。代议民主最早的支持者们为他们的立场还提出了更实用的理由。这不过是对简单事实的简单陈述:在实践中,即使人们自己有这样的愿望,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卷入政府的决策和

运作。出于这样的现实，人民只能将政府的工作交给在定期选举中选出的代表去处理。这些代表的工作是监督公款的花销，以选民的名义向政府和政府机构问责，辩论公务和制定法律，决定谁应该担负管理工作和如何进行管理——当然，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

代议制民主成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命名和操作方式，具有某些特点，它有成文宪法，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还有保证程序得到执行的法律，而这些程序至今仍然是民主存在的关键条件：比如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禁止酷刑和非法的监禁、立法会成员的定期选举、公职的有限任期、无记名投票、全民公决和罢免权、选举人制度、政党竞争、督察制度、公民社会，以及诸如公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公民自由。与前一阶段的大会式民主相比，代议制民主可以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上进行人民的自我治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代议制是起源于小城镇、农村社区还是

xx 大规模帝国，最后它落户在有常备军保护，并拥有立法和执法，以及向所辖人民征税的暴力工具的领土国家之上。这样的国家的规模和人口往往超过古代民主国家。大会民主时代的大部分希腊城邦，比如曼提尼亞和阿格斯，面积不过几个平方公里。许多现代代议制民主国家的规模之大，使之完全失去了对比的意义——比如加拿大(998万平方公里)、美国(963万平方公里)，而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选区是澳大利亚联邦内西澳大利亚州卡尔古力市(Kalgoorlie)周围的广袤农区，在这片23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生活着82000名选民。

导致形成代议制民主的变化既不是不可避免，在政治上也不是没有经受挑战。代议制民主不是必然要出现，但是它出现了。它是多种力量冲突的产物，包括人们在“人民”的名义下反抗统治集团的艰苦斗争——这些集团可以是教会，也可以是地主、君主或帝国的大军。到底谁是“人民”，一直是一个制造混乱的源泉。代议政治时代不仅复活了古老的民主语言，还赋予民主一词不少新含义。在古代民主派眼里，这些新含义不是不可理喻地相互矛盾，就是彻底的胡说八道。民主二期给自己挂上了不少新名牌，有“贵族民主”(首先在16世纪末发生在低地国家)，在美国率先出现了“共和民主”，后来又有了“社会民主”“自由民主”和“基督教民主”，甚至“资产阶级民主”“工人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这些新名词反

映了不同集团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力所做的种种奋斗,他们的斗争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政治制度、新理想和新生活方式,其中有些是人们刻意的追求,有些则是纯粹的意外或预料之外的成果。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成文宪法、定期选举、政党和不同选举制度之间的竞争都是新事物。建立在新的社会惯例和习俗——如在餐馆进晚餐、体育竞赛、使用礼貌的语言、控制自己的情绪——之上的“公民社会”和新的公民组织,让人民能够用出版自由、公开请愿、公约、召集制定新宪法的制宪会议等等非暴力手段制衡政府。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自治政府得到长足的发展,随之诞生了一种公民权力和公民责任的文化。值得注意的还有,民主二期也是大西洋地区合作社运动和工人运动大发展的时期,并第一次出现了“国际民主”的说法。

代议制时代的革命追求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因此被法国作家和政治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称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在它从大西洋三角地带向外传播的过程中,经常遭受到挫折和倒退,特别是在欧洲,民主制度在 20 世纪初几乎全军覆没。欧洲的民主革命开始于一系列粗暴的动荡,比如公开处决英国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对于权贵而言,人间的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革命的暴力则向权贵的反民主立场提出挑战。新的社会集团,如奴隶、妇女和工人开始赢得投票权。正式废除奴隶制标志着民主二期与大会民主的重大区别,民主一期通常要依赖奴隶制才能生存。至少在纸面上,代议制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某些有此愿望的国家)逐步实现了让所有的人都能享有民主的权利,但这个过程充满障碍和风险。可以说,这个过程始终都在经受考验;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的美国和西班牙语美洲国家,代议制退化到非常狭隘的地步,有些集团(如黑人、穷人和原住民)事实上丧失了他们的投票权。直到民主二期的最后——20 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内,投票选举代表的权利才被视为是一件普世的赋权。最早是成年男子得到投票权,过了很久之后,这个权利才过渡到成年妇女。即使取得了这样的进展,反对代议民主的力量仍一直非常强大,正如我们在专制政权和军人独裁统治中所看到的那样。尽管这些统治在人们眼中既无能又邪恶,但它们仍有大把的机会占据上风。它们的得势告诉我们,任何形式的民主都不是必

然要出现的政治制度，民主本身并没有任何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 监督式民主

我们今天所知道和体验的民主正在发生何种变化？当今世界的民主会有美好的未来吗？它们正在经受衰落，还是正在转型为一种“后民主”制度？民主还是一种有活力、为人所向往的生活方式吗？还是像可怜的渡渡鸟，像复活节岛上的森林，或者像我们地球极圈内的冰帽子，民主正在走向自己濒临灭绝的宿命？

当今民主制度的不完美，给这些问题涂上了些许怨气和先见之明的色彩。今天的民主很像是一些尚未给出最后结果的实验。为了知道当今世界民主可能的走向，本书扮演了时间代言人的角色。我想以此来强调，日出日落，此时此刻，民主的历史仍在制造之中。我让一位想象中的历史学家，站在比今天超前几十年的地方回望，让她为我们展开历史的画卷，讲述共同决定今后几十年民主命运的观念、人物、事件和制度。我想要本书的读者想象一位冷静的观察者对我们的时代会说些什么。当然这只是观察今天的一种方式。但是对我们身处的世界保持某种距离，可能会让我们看到一些本来看不见的东西。它向我们提出挑战，让我们思考某些全新的，或者具有潜在巨大威胁、但是又完全没有被理解，或者完全被忽视了的大趋势。

这种在后脑勺上装上想象之目，让我们站在 50 年之后回望今天的技巧，也给了我们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在全世界的骤然新生。与人们一般会想到的不同，“民主大复兴”不是 1974 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的产物，也不是 1989 年中欧和东欧“天鹅绒革命”的产物。民主大复兴的过程开始的时间要早得多，当然我不是说复兴的过程已经结束，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将民主推出它传统的领地，走进了一片广阔而陌生的疆土。民主已经是一股全球性的大趋势。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都知道了民主的语言、思想和制度，不论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国籍、宗教和文化，人们不仅在谈论“全球民主”，而且还将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我这里使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

亚·森(Amartya Sen)的原话]。也是第一次,种族歧视和排外偏见开始不见容于民主观念,世界各地的民主派都会对类似“野蛮人”“未开化”或“天生低人一等”的言论感到害臊或愤怒,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那个可怕的时期,这些正是人们的流行话语。

大气候向有利于民主的方向转变令人印象深刻。自“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独裁者都感到时运不佳,重温美国作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 19 世纪晚期创作的小说《民主》(Democracy),可以帮助我们衡量一下民主力量的强大程度。小说的女主人公玛德琳·李对美国首都华盛顿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生活感到厌倦。她辞去了工作,叹息说:“民主让我神经崩溃,我要去埃及。”而在新的民主时代,在全球民主革命的强大压力之下,即使埃及这样的国家也不再是那些恐惧或腻烦民主的人的避难所了。在 1941 年,全世界只剩下 11 个民主国家,但在经历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挫折之后,民主起死回生。在英国、美国和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它扛住了空袭和军事入侵的威胁,挺过了经济萧条和道德败坏。尽管有种种阻碍,民主在印度的大地上扎了根,它成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民主政体,民主得到了物质极为贫乏的人民的支持,而这些人民还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讲着不同的语言,大部分人只字不识。南非接受了民主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拉美和中欧—东欧则让民主获得了新的生命。在民主历史上第一次,民主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政治语言。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大陆,无论是印度、埃及、澳大利亚,还是阿根廷和肯尼亚这些背景迥异的国家,都讲着民主的话语。甚至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也爆发了争取民主的斗争。21 世纪最初的几年中,黎巴嫩发生了“雪松革命”,格鲁吉亚发生了“玫瑰革命”,乌克兰发生了“橙色革命”。民主的精神在日本、蒙古、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都找到了自己的旺盛的生命。在缅甸、朝鲜等国,尽管铁幕紧锁,但在门外的过厅和走廊里,也能够听见人们在谈论民主,并开始拍打紧闭的大门。

民主在全世界信步前行的大趋势如此之显著,一份颇有力的报告甚至说,20 世纪可谓是“民主世纪”。报告说,在 1900 年,君主制和帝国居统治地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允许公民普选权和多党选举,只有 25 个国家实行“有限制的民主”,这些有限民主国家的总人口只占当时世界

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到 1950 年,随着打败纳粹、非殖民化、欧洲和日本的战后重建,世界上有了 22 个民主国家,它们拥有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报告说,到 20 世纪末,(在世界上 192 个国家中的)119 个国家可以被称为“实行选举的民主国家”,其中 85 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38%——享有“尊重基本人权和法制”的民主制度。报告还说,民主制度已经遍及世界各个地区,它的结论是:“20 世纪可以说是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世纪’。”最后它还特别表示,“全球人权和民主意识的增长,反映了民主实践和民主赋权正在扩张,它们正在进入世界各地,进入所有的主要文明和宗教。”<sup>⑤</sup>

xxv 报告的结论很有一股诱惑的味道。它非常聪明地抬出了正在成为主流的大众意识,即是人民而不是那些自以为超越人民的专制统治者,才有权掌握管治的权力;这份报告对民主的定义着意包装,对分析的方法遮遮盖盖,目的就是想说明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代议民主已经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生死民主》则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老老实实的态度来观察民主的走向。将民主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力求使用各种不同的定义和更细致的分析框架。本书的结论是,民主今天的趋势非常不同于、甚至有悖于“自由之家”发布的这类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短视的报告,民主的发展不仅比报告所论更复杂,也更有意思。

如果有关民主所向披靡的夸夸其谈都是谎话,那么,真正发生的故事又是什么呢?不错,这个诞生在古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迈锡尼的城镇和古希腊的美好愿望,在过去 70 年间取得长足发展,作为实践的民主和作为理念的民主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受人欢迎。以美国为首的当代民主,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的力量,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前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娜·奥尔布莱特倡议成立了民主国家联盟——“民主俱乐部”<sup>⑥</sup>,这些成员已经将民主标签贴到了世界地图上的每一个角落,也让它继续接受人们的检验。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在民主的第三个时代里,即便是独裁者为了给自己寻找存在的借口,也要披上民主的外衣。其中的大多数人,比如普京、卡扎菲上校和李光耀都不得不追逐时尚,宣称自己是民主派,尽管他们只是用民主的话语来掩饰自己的本意。<sup>⑦</sup>在共产主义土崩瓦解的时候,所有老一代